

一种圣洁的感情

——读阿来的《云中记》

■ 胡平

阿来的《云中记》是一部神圣的生命颂歌，而不仅是悲天悯人之作。颂歌唱响的时候，人们是仰望上空的，而空中透过云层洒下阳光。当然，《云中记》也是一首《安魂曲》，寄托了作者对汶川地震死难者的深切缅怀。作品的高贵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真正的精神性写作，与世俗性写作不同。作者有几句讲大地震的话，并非与人为敌；人民蒙难，但除了依止于大地，人无处可去，亦即说，这是一件无从抱怨的事情，但生命不因此而显得卑微，相反，是在命运面前显得更加庄重。

小说里的祭师阿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他独自返回云中村，挨家挨户去寻找和抚慰亡灵。在俗常眼光看来，也许疑虑他此举的意义，但我们知道，曾经有人独守深山为红军墓看护了几十年，也有人常年驻守在越战中牺牲的战士墓地，如果他们的看守是有价值的，那么，祭师去安抚村中100多个普通老百姓的魂灵也是有价值的，他为此献身，也是崇高的。这里面的价值只涉及精神价值，使这部作品成为精神性写作。精神性写作涉及真理、真相、正义、良知、同情、忏悔、灵魂、救赎、宽容、博爱等理念，在平庸观念里，这些都属于可重视也可放弃，并无实际用

途，但作家不能这么想，作家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要引导中国人往“虚”处想，承认一些形而上的观念。习总书记说，作为精神事业，文化艺术“当然就是一个灵魂的创作”，《云中记》就属于灵魂层面的创作。

写好阿巴这个特殊人物是不容易的，但作者设计上处理得很好，并赋予其鲜明个性。首先，关于他的身份，他并不涉及大的教派，他属于苯教，只有云中村和远处三个村子里有这种原始宗教，而且，祭祀的只是自己村子的山神。

其次，阿巴被政府正式授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称号，他的活动具有合法性，他自己也认为，既然政府让他当了这个传承人，他就要好好履职。

再次，他对教义及程序并不很熟悉，其职责是由父亲那里传下来的。平时他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以劳动谋生。他懂得祭山，不懂得招魂，对于有没有鬼魂这种东西，他是弄不清的，直到返回云



《云中记》
阿来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中村时也不清楚。

最后，正是这样一个半路出家、半吊子，通不了灵、和神说不上话、自己也怀疑自己的祭师，却是真正有着大爱悲悯之心且忠于职守的。他回到云中村，去照料村里的鬼魂，在村里烧起一堆火，让

故人们知道有活人回来陪伴他们了。在作者笔下，对于到底有没有魂灵，他有自己的解释：阿巴也但愿这个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是，如果万一有，云中村的鬼魂就真是太可怜了。活人可以移民，鬼魂能移去哪儿呢？所以，他要回到村里，烧香，摇铃击鼓，看望妹妹，跟村里每个没有走掉的人都打过招呼，告诉他们阿巴回来了。当乡长的外甥劝他离开，说人死了就什么都听不见了，他也有他的逻辑，说我也不知道死了的人能不能听见，但要是能听见，却没有人来和他们说话，那怎么办？读者为他的逻辑和解释所感动，你可以说他无法证明他的理由，但你无法怀疑，他是在从各种可能性上去为死去的人们着想，更无法怀疑，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深深打动人心。文学，是不是应该表达这种圣洁的不那么人间烟火的感情呢？阿巴回村里的时刻，正是云中村即将坍塌和彻底消失的时刻，他把亡魂们召集到一起，尽到一个

祭师的责任，最后和村庄一起消失。他做到了，有谁还要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吗？文学，本身也应该是一个祭师，应该出现在慰藉人们灵魂的时刻。

有时候人们容易活得太理智、考虑得太实际，而忘记人生的完整意义。前些天读一篇文章，写一个两岁的女孩，生下来就是青光眼，眼睛是蓝的，看不见，也不能说话，被父母遗弃了。一对夫妇偶然知道了这件事，他们虽然自己有两个孩子，还是好心收养了可怜的女孩，带她辗转求医做手术。女孩两只眼睛都被迫挖掉，但却活了下来。这家人待女孩完全像亲生，哥哥姐姐也一直在保护她。以后，女孩生平第一次主动拥抱了亲人，也拥抱了人生和世界。夫妇两人始终没有后悔过这次收养，反而说，是女孩教会了他们“如何去爱”这一课。至于女孩的哥哥和姐姐，也从小比其他孩子更懂得了爱。我想说，《云中记》中的阿巴，和这对夫妇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胸怀远比俗常人广阔，更懂得人生意义的完整、生命的可贵，以及如何去爱。有出息的文学家，自然天生不能长久匍匐于地面，“谁能凌驾于生活之上，不难领悟那百花和沉默万物的私语！”

我们喜欢阿来，无论他在写什么，阿来就是阿来。

坚守爱和信仰的悲壮史诗

——读贝拉长篇小说《幸存者之歌》

■ 安波舜

七年前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上，好莱坞顶尖制片人、八次获得奥斯卡奖的迈克·麦德沃走上舞台领取杰出成就奖。他说非常感谢上海，因为这座城市救了他们一家……

与迈克一起走红地毯的是女作家贝拉。当时，迈克正应上影厂之邀拍摄根据贝拉二战犹太人题材小说《魔咒钢琴》而改编的电影。

迈克诞生在二战时期的上海，父亲大卫和母亲朵拉在上海恋爱结婚，并和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一样受到上海的庇护，度过人生最苦难的岁月。迈克父亲大卫与朵拉结婚后在上海生下了迈克。

令贝拉感动的是迈克向她叙述的父母爱情经历以及父亲在上海早期电话公司的职业经历。在史料中，贝拉惊喜地发现了大卫的履历表、照片等第一手资料，她笔下的故事就此缓缓拉开序幕：一个二战时期犹太电信工的上海梦。近代史上的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和东方最早的开放城市，是中国工业文明和外来文化的起点和“窗口”。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上海，也是世界的上海。近100多年来，上海以它的开放和包容，吸收、容纳、汇入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文化，资金和人才。

讲好中国故事，不能不讲上海故事。而要讲好上海故事，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从纷繁复杂的人物和时代背景中拎出具有审美价值的故事和人物灵魂，因此作家必须要有信仰。信仰对普通人来说是宗教，是情怀；对作家来说，则是爱和恨的视角，是灵魂美丑的雕刻刀，是剖析和梳理故事和情节的原动力。而这些，恰恰是贝拉所擅长的，于是，就有了这部《幸存者之歌》。

《幸存者之歌》里的主要人物，也是结构人物是迈克的父亲和母亲——年轻的俄罗斯犹太人青年大卫和朵拉。他们由于战争流亡到了上海，又因为签证的原因滞留在了上海，与30000多来自波兰等国的欧洲犹太难民一起，生活在日寇蹂躏下的上海。尽管生活艰难，苦难深重，但是，大卫和朵拉他们并没有失去尊严和信仰。大卫从一个擦鞋匠，逐渐成为电话公司的线路维修工，进而为了爱情，为了给朵拉一个像样的家，努力创新，在英法租界研制开发了为中国难民服务的公共投币电话亭。到了上海解放的前夕，大卫已经成长为电话公司的主要负责人。

大卫的成长经历，生动地诠释了犹太人在苦难和绝望中，依靠信仰的力量，乐观豁达、生生不息的生命意志和永不放弃的毅力。同时，小说中也生动刻画了犹太人的另一面：朵拉的父亲艾萨克，一个精于算计、凡事计较，为了家庭和孩子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犹太人。他把女儿朵拉当成自己的一个生意筹码，一个可以换算多少面包和住房面积的商品。最终，是爱和时代改变了朵拉的父亲艾萨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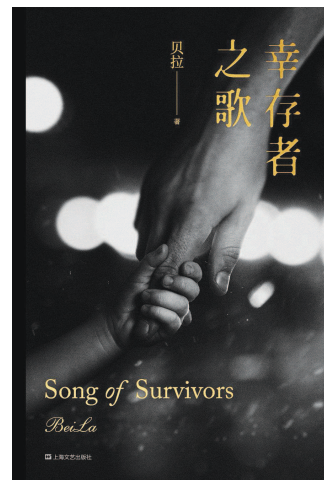
小说中，还有一个人物叫沃尔夫，他是一个曾经风靡奥地利的男高音歌唱家，他在上海开了一家咖啡馆，叫“香肠男高音”。上海犹太难民史上，在霍山路，确实有一个男高音歌唱家开过一个叫“香肠男高音”的咖啡馆，主卖特色产品慕尼黑香肠和啤酒。沃尔夫在贝拉的小说中，就是一本打开的《塔木德》。《塔木德》是犹太人的智慧结晶和处事圣经。他是朵拉教父般的人物，是大卫的精神导师，是犹太社区苦难中的灯塔。正是沃尔夫的存在，让《幸

幸存者之歌》屹立于信仰的维度，也有了在人性刻画中，在故事氛围里，那束照射灵魂的光芒，使全书人物命运有了宿命感。这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小说，使其成为一部表现面对死亡和苦难时，依然坚守爱和信仰的悲壮史诗。

围绕大卫和朵拉的故事主线，《幸存者之歌》牵出另一组旧上海最时髦的人物——用中英文接听电话的时尚小姐姚慧君们。她们代表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上海和殖民文化；她们的身影活跃在上海外滩会所和高级酒店；她们高雅高傲，追求高级的生活品质，是旧上海最早的一批受过西式高等教育的世家子女；她们抽烟、跳舞，形象经常印在挂历、招贴画和月历牌上……但光鲜亮丽只是她们的表面，她们的内心却是孤独冷漠的，因为不肯向世俗和庸俗低头，一生只能默默地守望着内心的爱情和追求。与她们的遭遇对应的是上海工商界的纨绔子弟和外国淘金者。而这些人物，没有一个是脸谱化的，个个栩栩如生，令人唏嘘。

其中最复杂化的人物是姚慧君的前夫陆天河。陆天河是美籍华裔，深爱朵拉，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自己家族的财产不被日本占领当局当作敌产没收，而不得不与有日伪政权背景的姚慧君家族联姻。这样的婚姻，无论对男对女，对人性、对家庭，都极具破坏性。他们的故事，从古至今，都能演绎出决绝的悲情和意外。贝拉的小说，将这一组人物的命运写得惊心动魄。

《幸存者之歌》的故事内核与背景，源于真实存在的上海早期电信公司——美商上海电话公司。这家公司在上海经历了



《幸存者之歌》
贝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三个阶段：抗战前、抗战中和抗战后。犹太青年大卫的成长经历与此有关，女主人公姚慧君的爱情也与此有关，这家公司还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情报战有关，于是，美商电话公司就成为这部小说的舞台。通过贝拉的挖掘，小说再现了那些用生命为抗战输送情报的特工，保护上海电信设施的前辈，以及留洋归来的工程技术专家等，歌颂了他们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这些事迹，不是简单的叙述，而是紧张激烈、充满故事张力的描写。他们的出生入死和机智勇敢，他们的苦难悲伤，同样构成小说的动人情节。可以说，《幸存者之歌》在客观上展现了上海近代工业文明和现代通讯业的发展脉络。而它的问世，某种程度上也是向上海电信业的前辈、向用科技报国的工程技术专家的致敬；是向上海，这座贝拉心中伟大故乡的献礼。

据悉，《幸存者之歌》中文版出版之际，英文版的翻译也在进行中，将由著名汉学家、《魔咒钢琴》的译者葛浩文执笔。而小说主人公大卫的儿子、好莱坞制片人迈克·麦德沃也希望有生之年能将父母的上海故事搬上银幕。《幸存者之歌》已然成为把中国故事、尤其是上海故事推向世界的绝佳范本。